

在马来西亚发现中华文化

许纪霖

一个整体性的华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如何建构的呢?由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所构成的中国文化,只是文化的“小传统”,而将不同族群想象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一个更高形态的共同体,还要有赖于文化的“大传统”。

何为中国,这是近些年学界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理解,当然是包括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在内的中国,然而,在当今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文化的“中国”,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的繁衍。去年,我应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邀请,到吉隆坡参加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国际研讨会。在马来西亚一周的学术考察,让我欣喜地发现,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就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生活着5000万以上龙的传人,其中80%居住在东南亚。在泰国、缅甸和老挝这些佛教国家,大多数华人已经与当地入融为一体。在印尼,华人人口有1000万,但长期以来在政府的限制下,华文学校被迫关闭,华人基本上不会说华语、写华文,也面临被同化的命运。新加坡尽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但英语才是公共领域的语言,而华语与马来亚语、印度语一样,只是私人领域的交往媒介。唯独马来西亚这个以马来人为主体的穆斯林国家,占总人口不到20%的华人,却顽强地坚守着中华文化的认同。来到马来西亚,中国人几乎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到处是你熟悉的中文,正宗地道的粤菜、闽南菜和海南鸡饭,还有令人亲切的黄皮肤、黑头发。那么,近700万的马来西亚华人,

究竟如何实现了南洋其他国家华人的梦想,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华人社会呢?他们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当我回到上海,带着对马来西亚考察的新鲜感,从书架上找到了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孔飞力在十多年出版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借助他的宏大视野和深邃分析,对海外的文化中国有了一种别有洞天的感悟。

还是从下南洋的故事说起吧!在明清之际,在南中国海的宽阔海域,借助东北季风,大批福建人和广东人乘坐一叶帆船,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半岛,开始了华人在南洋的历史。我曾经做过研究,发现中国南北文化的历史差异,在于北方文化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而南方文化,则是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重叠。中原的农耕民族是保守的、拘谨的,父母在,不远游,重农轻商。而从广东到福建的这些南方沿海地区,到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海洋族群,因为地少人多,谋生不宜,这些广东、福建人靠海吃海,类似西欧的海洋民族,很有一些冒险精神和商业头脑,南中国海也因此成为了他们向外活动的新疆域,不仅形成了卜正民教授在《哈佛中国史》中所说的以白银为媒介的“南中国海商贸圈”,而且将开拓南洋作为自己新的谋生之路。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以文明自我定义的国家,而非现在熟悉的民族国家,国人到了南洋,就将文化中国带到了那里。他们是移民吗?又是,又不是。孔飞力教授发现,中文里面并没有英文emigrant(向外移民)相应的词汇,我们只有“安土重迁”和“衣锦还乡”的概念。下南洋,只是为了谋生,不是做生意,就是开矿做劳工。马来西亚半岛的华人,只是将那里作为临时的迁移之地,他们的根还是在遥远的故乡。对于他们来说,移民的真正内涵,不是“分离”,而是“关联”,那种文化上的血肉关联。

孔飞力教授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通道”与“小生境”。所谓“通道”,就是这些新移民们在南洋和自己的故乡建立了一个广泛而密切的交往网络,既有实质性的人员、资金和信息的双向交流,也有虚拟性的情感、文化和信仰的互相交织。他们在马来西亚半岛竟然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文化中国的“小生境”,将故乡的各种文化元素与社会建制如数搬到南洋社会。移民社会的这种横向文化移植,全世界除了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穆斯林之外,大概就数华人最突出了。

那么,马来西亚华人的横向移植,创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小生境”呢?简单地说,就是以血缘、地缘和信缘为纽带的华人交往网络。一个初来乍到的中国人,远渡大海之后来到南洋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甚至你都不用找,从踏上大船的那一刻起,你已经是某个先定的关系网络之成员。不然,你都没有勇气下南洋。孤身一人出洋探险,显然不是中国人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期间,新纪元学院的廖朝骥和白伟权两位年轻教授陪我们几位中国来的学者考察吉隆坡的华人历史文化。他们提出,第一站去处于老市中心的华人义山。所谓义山,就是当年这些华人移民们的墓地。白教授是人文地理专业出身,专门研

究华人的社群,他带领我们在一块块墓碑中穿梭,详细讲解墓碑上的碑文。我恍然大悟,这义山,正是了解华人文化网络的一把入门的钥匙!

中国人的第一层关系网络是宗法血缘,那是从西周封建时代就遗传下来的文化基因。当年远渡南洋的华人,来自不同的家族,未必有共同的祖宗和族谱将他们粘合在一起。但我们在墓地中发现了好几块“谢氏总墓”、“欧阳氏大总墓”这样的墓碑。原来,在南洋,血缘网络体现在同宗同姓,五百年前原是一家人,同一个姓氏的移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拟血缘的网络,建立同宗的堂所,比如谢氏的“宝树堂”、欧阳氏的“渤海堂”。死了之后,就埋葬在同一个墓穴,即使不能叶落归根,与家人聚合,至少可以与同宗姓的族人共眠地下了。你或许会问,大姓氏族还好办,找得到同宗,那些冷僻的小姓怎么办?历史记载,常常有若干姓氏的人们以一个纯属虚拟的新姓氏名下实现联宗,可见传统中国人是如何相信血浓于水,没有亲缘,也要创造一个拟宗姓的网络关系出来。

距离吉隆坡的唐人街“茨厂街”不远,有一座马来西亚国家重点历史文化遗产“陈氏书院”。这是1906年由新马一批陈姓的商人们,仿照广州著名的陈家祠,共同集资兴建的。主殿德星堂供奉着三位陈氏的远祖:舜帝重华公、颍川始祖陈实公和开漳圣王元光公。百年过去了,书院依然雕梁画栋,异常精美,即使放在国内,也算得上是一流的古建筑文物。

血缘关系毕竟难得,在新马华人当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无疑是地缘的同乡网络。但所谓广东人、福建人的省籍意识,其实是近代的产物。在明清时代,省籍意识是很淡薄的,所谓的地缘,就是以某个方言为核心的方言社群。当年来到马来西亚半岛的华人,有五个不同的方言群: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和海南人。他们结伴而



孔飞力著《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来,分群而居,新加坡和马六甲是闽南人的天下,怡保是广府人的地盘,而檳城则是福建人、广东人共同的地域。

来马来西亚之前,一位香港朋友力劝我一定要去怡保,说很像他小时候生活的老香港。怡保是霹靂州的首府,地处吉隆坡与檳城的中点位置,整个小城不仅被美丽的大自然簇拥,而且南洋风格的老街道、古建筑也保持得非常完整,满街都是汉字招牌,到处听到婉转的粤语,仿佛又到了中国岭南。霹靂州的华人原初是来采矿的,这里以锡矿出名。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方言群,因共同的地缘网络抱团生存,但也因此而分裂、内斗。闽南人内部的泉州帮与漳州帮、广府人与客家人、潮州人,为了争夺矿产、土地和水资源,都爆发过激烈的械斗。传统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分子化的社群,按照特定的血缘和地缘组织起来的共同体,虽然是同构的,却形成不了更高层次的合作与联合,彼此之间会有纷争。马来亚早期的华人历史,就是如此。

为了维持华人社会的秩序,保证殖民当局的正常税收,荷兰统治者任命一位华人头面人物担任甲必丹,即华人社会的总头领,由他负责包揽税收,并管理当地华人的公共事务。既然华人社群四分五裂,那么,谁有资格获取一言九鼎的甲必丹位置呢?

(下转6版) →



马来西亚国家重点历史文物遗产“陈氏书院”,1906年由新马一批陈姓的商人仿照广州著名的陈家祠,共同集资兴建。